

# 从“南北、东西”关系看中国 宏观区位结构及其变动

吴怀连

本文从宏观和历史的视角叙述了我国区位结构从“南北关系”到“东西关系”的演化,揭示了传统地缘秩序和近代以来地缘秩序的内在矛盾性,探讨了它们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代意义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作者肯定了坚持“改革”、“开放”和“治理整顿”有机统一,当前重点突出后者,对于保持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的必要性;主张作为这种选择的地域映射,地域发展应优先考虑京广线沿线地区,提出了中部崛起、东靠西移的地域发展战略的新思路。文章首次运用“区位论”对中国宏观地域结构进行动态分析,从“南北、东西”关系看其矛盾和变化特征,理论上有一定深度和新颖性,实践上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社会区位研究是社会学区位分析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区位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目前,绝大部分的研究限于微、中观区位如对村落、集镇、城市体系及其内部构造的探讨,对宏观区位——大地域结构的研究较少。本文试图用区位论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宏观区位的特征及其运动,这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理解当前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和社会发展的地域性质,是有帮助的。

## 一、核心——边缘地带：中国传统社会的宏观区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宏观区位结构由两大地域带所组成：一是农耕区的核心地带；一是边缘地带。所谓核心地带，广义地说，就是冀朝鼎所说的“基本经济区”。他指出，在中国自给自足条件下，支撑着中央王朝统一与集权的，是靠近都城，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这个区域就叫“基本经济区”。他十分重视这个区域的存在。他说：“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上的差异，同时还加强了不同地区走向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趋势。基本经济区的存在还影响到商业资本的分布，并为其发展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条件”。甚至他还认为，中国社会的统一与分裂的根源在于基本经济区的变化。<sup>①</sup>按他的意思引伸，只要控制了基本经济区，就算控制了中国。基本经济区之外，还存在非基本经济区，也就是核心地带之外的边缘地带。相比之下，它不很重要。

施坚雅对中国的“核心——边缘”结构另有定义。他在《中国城市和地方系统的等级》一文中，将八大自然区都按人口密度、贸易额划分为一个个核心——边缘地带。他认为，中国区域的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区域之核心地区可耕地的比例要比边缘地区

高，前者可耕地通常比后者更为肥沃，还有核心地区灌溉地亩数的比例通常比边缘地区的来得高。核心地区每单位可耕地中(有时每人)投在排水、改造、灌溉和抗洪上的资本的水平远比边缘地区的高”，“同样道理，对运输——桥梁、运河和水闸——的投资，核心地区也相对大些。最后，因为核心地区的运输费用相对较低以及它们的运输网也较为稠密，所以无论从市场生产更多的经济作物和手工产品的意义来说，还是从日常生活消费品方面更依赖于市场的角度来说，核心地区的地方经济总比边缘地区的来得更商品化。”<sup>②</sup>除此之外，核心地带和边缘地带还有市场中心地的数量和人口密度等等的不同。在39000个城镇中心地中，虽然核心地带只占48.3%，但是随着中心地级别的升高，它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中心市镇以上，核心地带所占比重就超过了边缘地带，到最高的两级：中心都会和区域都会，核心地带所占比重达到100%和90%。他还研究了行政中心地的控制跨度，发现“控制的跨度之不同和级别以及行政首府的类型有关，这种不同的程度本身就反映了各级行政单位在区域的核心——边缘结构里的位置。”一般而言，核心地带控制跨度要相对宽些，而边缘地带要相对窄些<sup>③</sup>。

上述两种说法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前者只是就全国而言，后者说的是全国八大区域内的情况，而核心——边缘结构在全国和大区域内都存在，是一种普适性现象。从全国来看，都城所在地显然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距都城遥远的边地则是边缘地带。从各大区域内部看，情形往往相似，所不同的只是规模要小一些，级别要低一些。核心地带提供了都城和区域中心居民控制全国和区域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绝大部分，是全国和区域行政权力的根据地，也是社会稳定的支撑点。因而也较多地受到行政权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照顾”：政治上，这一地带的人才容易进入行政权力的核心和顶层；经济上，中央和地方在这一地带有更多的投资。与此相反，边缘地带只是作为统治和控制的对象存在，它向统治者提供财政支持，但受到的照顾则明显地少于核心地带。由于两个地带在内部经济力量和外部支持方面相差悬殊，核心地带的社会经济引力和辐射力也就远远大于边缘地带。因此，这种结构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地域社会经济要素的向心流动。核心地带只要有可能和愿意，它总会把大量的边缘地带的人力、资本和知识吸引到自己身边。在争夺地域要素如资本、劳力和市场的“战争”中，核心地带总是稳操胜券。大批劳动力和资本流向核心地带，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发展；而相比之下，边缘地带总是处于失血状态：投资不足，劳动力缺乏，经济也相对萎缩或停滞不前。一方面是核心地带的快马加鞭；另一方面是边缘地带的一蹶不振，这是一种马太效应：富有的更富有，贫穷的更贫穷。

当然，核心地带优先发展也是有限度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核心地带，唐以前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唐宋以后，它就随着中国版图的变更，朝南北两个方向移动。造成这种反向移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看，核心地带对中央权力的垄断，往往会损害这一地区的政治进取心，日益奢靡的生活也会侵蚀人们的行政管理及决策能力；从经济上看，过度开发容易导致资源破坏，豪华必定伴随着浪费，人口过密、生态失衡都是增长型经济的后果，最终它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社会结构矛盾所聚集的反社会力量的爆发，对这一地区社会破坏最大。相反，边缘地带政治劣势可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与创新精神，也可以锻炼边地领袖的才能；经济发展的迟滞，使人保持了一种艰苦的作风，使资源相对丰裕；社会闭塞也意外地使边地人民免受战乱之苦。这与核心——边缘结构的不平衡作用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而且它正是地域不平衡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只有这种反向运动，才有可能在边缘地带生长出新的核心点，形成更大范围的核心——边缘的地域结构。

## 二、南北冲突与中国传统政治

关于南北冲突与中国传统政治，梁启超有一段著名论述。他写道：“历览前史，大抵北人南伐者则得志，南人北伐者则不得志。其在北者，如五胡起而晋以东，金辽起而宋以南，蒙古起而宋金夷，满州起而明社屋。此皆外种凭藉异域，姑勿具论。刘、项同为淮人，而汉居关中巴蜀，楚居江淮，成功卒归刘氏。三国鼎立，而吴入于晋；六朝并峙，而陈入于隋。自古南渡偏安之局，曾无一焉能北进以恢复者。（幸陕幸蜀者有恢复，渡江者无恢复，其故可思也）。不可谓非地理上一疑问焉。北伐之师，惟项羽以江东八千破秦，孙坚以吴会一旅入洛，最称名誉，然卒归于败衄。尔后刘裕之灭南燕，灭后秦，号称南朝，第一盛举，亦不能竟其功。此外，南北交战，南人之有功者，千余年不过三役：一曰周瑜之于赤壁；二曰谢玄之于淝水；三曰虞允文之于采石。然皆防御而已，于进取则概乎未之有闻也。”<sup>④</sup>

这一段讲的是中国社会中南北冲突的情况。梁氏历数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南北冲突，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都以北胜南败而告终？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宏观区位即核心——边缘结构运动，核心地带扩张与迁移中寻找。

前面说过，核心地带发展到一定程度，地域运动便会出现反向运动，即向边缘地带扩张。我国东面临海，西面是青藏高原，地理环境限制了核心地带的东西扩张。因此，只能向北拓展和向南迁移。

这里所说的北拓，就是越过长城，在塞北草原地区进行垦种活动。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少量的汉人，由于战乱与灾荒，从内地逃到塞外，安家落户。秦汉时期，政府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又大量地组织移民，在长城内外驻屯耕种。由于农耕活动的经济收益较高，所以，不少与汉人接近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汉化，参与了草原上的种植活动。这样，农耕的边界便逐渐北移。当然，北拓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其间也有反复，有时垦荒成田，也有时返耕还牧。北拓的最大障碍，是长城以北的自然条件，不太适宜于耕种，农民不能靠耕种积累起强大的经济力量，来巩固他们占有的区域。同时，北拓也侵犯了游牧人的利益，引起他们的反抗；农区的财富，也诱使他们南侵，从而在长城内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常常有铁血之争。牧民常以骑兵优势，横扫漠南河北，使农耕区的北拓，步履艰难。近二千年来，北拓的成效虽有，但并不显著。

核心地带扩张的另一个方向是南移。

中国最早的核心地带在黄河中游地区，其后向东扩展至下游地区。东汉后，核心地带开始向南扩展。三国时吴、蜀两个政权为南方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其后北方居民又有三次大的南迁浪潮：第一次是西晋末永嘉之乱后；第二次是唐中叶安史之乱后；第三次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三次大迁移之间，还有许多次小迁移。北方居民大量南迁的结果，一方面使原核心地带经济相对衰退，另一方面则使南方经济相对高涨，南方逐渐成为新的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

北拓和南移是中国传统社会核心地带扩张的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的扩张实际上包含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学意义：北拓，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价值，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挑战，不来自于海洋民族，而来自于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中国历朝都是将大部分军事力量放在北方，以抗击游牧民族的南侵。这样，中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就转移到以现北京为中心的地区。北京作为

华北与东北、长城内外的交通枢纽，作为东亚几大地缘政治板块的联接点，作为中国统一与稳定的战略要地，其地理位置日益重要。南移，则完全相反，它的实质意义就在于经济方面。北方军事费用和行政费用开支，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财政收入来源；核心地带人口的急剧增长，也需要寻找更广阔的殖民空间，长江中下游流域正是作为唐以后历代王朝赋税基地和安置剩余人口的新疆域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提供中国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大部分。

这种不同性质的扩张，使南北地域功能发生分化，加之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南方和北方居民文化心理素质日趋不同。梁启超说，南北风俗文化差异很大，“北俊南靡，北萧南舒，北强南秀，北儻南华。”<sup>⑤</sup>这就给我们以提示：如果经商传道，北不如南；如果兴兵攻杀，则可能南不如北。而在封建社会，政治暴力和军事强权是社会控制的基础，诉诸武力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在武勇的北方和文弱的南方之间发生的冲突，自然大多是北胜南败。

南北地域功能分化，以及它们之间冲突，对中国传统政治有极大的影响。首先，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与政治不相协调，经济效益与政治稳定难以两全。若把重心放到北方，政治以强权支撑，社会稳定，但经济必然相对停滞；若把重心放到南方，经济发展很快，但政治软弱，社会危机四伏，地方主义横行，最后导致中央偏安于一隅的局面。历史上建都于北强而不盛或盛而不久，建都于南盛而不强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次，南北对立和南北冲突，就大要而言，反映了中国经济势力与军事政治势力的对立与冲突。北方以军事与政治权力使南方臣服，而南方则以财富与文化的优势征服了北方。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迟滞，那么这种迟滞只能表现在“马上打天下”最后还得以文治天下，北方征服南方最后还得被南方反征服这样一种发展中。这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难题。历代政治评述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更没有解决这一点。

### 三、中国宏观区位结构的变化

到了近代，传统的南北关系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中国宏观区位结构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动。这种变动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宏观区位第一次不再以南北划线，而以东、西（或沿海、内地）划线了。东西关系逐渐取代了南北关系，成为构成我国宏观区位的主要地域关系。

所谓东部沿海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七省三市和一个自治区。它的土地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3.6%，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1.4%（1982年）。近代以来，它作为一个大区域带，在中国宏观区位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到1947年，沿海地带城镇人口比重达到65.3%，而内地则只有34.7%。1952年，沿海地带工业产量（包括手工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8%，如果不计手工业产量，则沿海地带工业产量所占的比重还要高——接近总产量的四分之三<sup>⑥</sup>。

所谓西部内地，亦称中部和西部，是指中国除东部沿海地带之外的所有部分。这个地带土地面积占全国的86.4%，人口占全国的58.6%（1982年）。它内部本来还可以分成几个次一级的区域，如蒙、新、青、藏边疆地区、黄土高原与黄河中游地区、云、贵、川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等，但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区域看作一个大区域。近代以来，它也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但经济地位在下降。1952年，内地工业产量只占全国总产量的32%，主要工业产品（除煤之外）如生铁、钢、钢材、电力、硫酸、金属加工品、棉纱、棉布、火柴、机制纸、糖、面粉、香烟等的产量比重，最高的没有超过37%，最低的只有1%。

沿海地带兴起，内地相对衰落，宏观地域结构变动，主要是西方工业殖民主义入侵的结果。外国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首先进入东部沿海地带。它们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一些主要城市和通商口岸，划定租界，建立中国人管不了的“国中之国”，并在那里大肆投资设厂，发展搜刮中国财富的经济力量。1902年，外国对华投资，仅上海一地，就占全部投资的21.7%，到1914年上升到27.7%。由于内地形势不稳，市场发育不好，民族资本也大都“孔雀东南飞”，聚集到沿海租界城市。1914年，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当时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40%以上。其它地区如东北、天津等地，也是当时工业资本的主要聚集地点。由于投资兴旺，所以沿海地带的经济发展很快，城市迅速扩大。如上海，1843年时人口仅23万，在全国城市中居第12位，而到1852年达到54万人，之后又迅速发展成全国第一大城市，1915年达到200万人，1930年310万，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它的人口高达546万<sup>⑦</sup>。其它租界城市发展也很迅速。如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在短短的30年中，人口便增长一千多倍，分别达到35万—38万人的规模，到了30年代，几个著名大城市的人口都急剧增加，如天津市人口达到150万，广州达到105万，沈阳达到61万，南京达到75万等。规模次一些的城市如唐山、抚顺、本溪、鞍山、无锡、南通、济南、徐州等发展也很快。

但近代以外资和民资主导的沿海经济率先发展，并没有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反而使中国陷入困境。这是因为，外资作为国际市场中心的一种辐射和引力，它的使命便是将作为市场边缘的中国的富源，经由沿海地带转移到作为市场中心的西方。如果说，那些外资，确实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也为这些企业所在的城市和沿海地区带来某种程度的畸形繁荣的话，那么它导致的宏观社会后果，便是失血的中国因两极分化后出现的贫困、劳力过剩与社会长久的动荡。如果说沿海地带确曾因接纳外资而暴富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西部内地绝大部分地区则因此而受穷，许多城市因此而衰落。如古城西安，30年代的人口不及1843年的一半。有些城市如太原、兰州、成都、贵阳、重庆、武汉、合肥等，如果以1843年的人口数为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这些城市的人口数分别只有110、110、100、140、100、120、110，90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由此看来，东西关系在地域结构上，仍不过是一种核心——边缘模式，但它同传统的不一样，它的核心地带在沿海，核心地带的“核”，不在中国，而在欧美——海洋那边的世界。这是一个以全球为范围的核心——边缘地域结构，只不过中国从此不再是“中”，而是“边”了。

#### 四、新地缘秩序矛盾性及其解决

我们可以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来看这种地缘秩序的矛盾性。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基于对工业布局的调整，把新的工业企业建在不易受到国外敌人军事袭击，同时又靠近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地方这样的考虑，从“一五”开始，工业化重心便转向了内地。1953年至1957年期间着手建设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三分之二以上建在内地。投资比例，“一五”和“二五”前3年，内地为58.2%，沿海为41.8%。到“三五”、“四五”期间，内地上升到60%，而沿海则只有40%。随着投资的增加，工业产值的地域结构也在发生变化。1952年到1973年，沿海地带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由68.3%降至64.1%，而内地的这个比例，同期上升了4.2个百分点。内地工业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化人口相应增加。1957年，内地城镇人口比重为13.34%，到1984年上升到28.09%。而它同沿海地带城镇人口的相对比，1947年为34.7:65.3，到1982年上升为

#### 54.8:45.2, 高于沿海地带。

这样做，确实改善了工业布局，也改变了中国经济长期以来依附于海外市场的局面。内地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缩小了与沿海经济的差距，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开发，对于维护内地与沿海的地域均势，保持社会稳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这样做也是付出了代价的。从经济效益上看，一直到现在，沿海地带的都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以资金利税率为例，1980年独立核算工业沿海地带高达35.19%，而中部只有18.02%，边疆省区更只有11.71%，其中最高的上海同最低的青海相差24倍。全国资金利税率达到23%以上的11省市，有10个在沿海。10%以下的5个省区，全部在内地(中、西部)<sup>⑥</sup>。因此，奉行内地优先发展的政策，势必影响沿海地带企业的更新改造，影响沿海经济的发展，最终结果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增长速度减慢。在内地建立一个新的工业中心所能得到的好处，即不易受到攻击和较低的运费，是以牺牲较高的工业增长速度为代价的。社会公平、稳定与经济效益不可兼得，要么我们选择前者，要么我们选择后者，不可能兼而有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选择什么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坚持经济效率至上主义，那么，在地域战略上优先发展沿海地带是对的，甚至也只有坚持优先发展沿海地带，才能达到目的。但不能奢望，这种战略会给中国带来社会公平与稳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设计，仅考虑经济增长而不考虑社会公平与稳定，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坚持社会公平至上主义，坚持政治稳定压倒一切，那么，在地域战略上优先发展内地是对的，甚至也只有在内地发展快于沿海，使内地与沿海的差距保持一定并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社会才能稳定。但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会牺牲经济增长。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真正的两难选择。

造成这种两难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经济是带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背景和运行目标进入现实世界的，同西方比照起来，它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性以及它们之间有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世界经济大势所趋，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关起门来“夜郎自大”，于是有“改革”、“开放”一说；另一方面，本土经济和社会伦理为社会稳定所系，它应该而且可能为自己的存在争得一席之地，于是有“坚持”、“反对”、经济上“治理整顿”一说。不可否认，它们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这种矛盾，实质上是本土经济与世界经济、社会伦理与经济理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选择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反对”、“治理整顿”的有机统一。在目前，重点突出“治理整顿”，使我国经济重新走上计划、协调、稳步发展的轨道，是正确的。作为这种选择的地域映射，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地缘秩序矛盾的解决，也必须充分注意到沿海与内地地域力量的性质及其分布，并考虑到它们对中国长期发展的影响，在“社会发展”这个总目标下，重点突出京广线沿线地区的发展。中部崛起，东靠西移，既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速度，又兼顾了社会公平与稳定所需要的地域力量，应该是当前地域发展战略决策中的一种最佳选择。

#### 注释：

①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② 《国外中国学译丛》，第104—105页。

③ 《国外中国学译丛》，第133—134页。

④⑤ 转引自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

⑥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上)

⑦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

⑧ 孙敬之：《中国经济地理概论》

⑨ 《中国经济地理概论》，第587页。